

积书，聚而散，散而复聚，其劬瘁固不忍言，而来者实不须再为此徒劳之举。昔叶昌炽作《藏书纪事诗》，自五代至于清末，集录千年来缥緲聚散之踪迹，备文化史料之一端，且使读者审其薪尽火传之端绪，识旧槧名钞之尚得流传至今日实仅居其万亿分之一，于以兴起其爱护祖国文化遗产之决心，其事弥合于今日之需要。伦明教授继之，然犹未能周尽。后有作者，倘将以我辈殿一军耶？是不可知已，亦不必强求已！圣陶已作《书巢记》于前，兹更拉杂写为后记以补充之，倘得伯翁之掀髯一笑也乎？

1966年4月1日，顾颉刚书于枫林村105室。

## 关于《书巢图卷》

王 湜 华

去年年底顾颉刚先生谢世，中国史学界失去了一位老专家、老前辈，我们失去了一位最尊敬而亲近的父执辈，心情万分悲痛。

先生一生著述宏富，远远不至“等身”之可比，有待整理而尚未发表的遗稿、数量也十分可观，今为纪念先生而本刊要先发表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为我父亲伯祥先生的《书巢图卷》所作长跋，为此特将《书巢图卷》及其来龙去脉作一简单的介绍。

我父亲自幼就喜读书，学生时代与顾颉刚先生、叶圣陶先生一起，几乎每日课余都要去玄妙观书肆，就以父母长辈们所给的零化钱、压岁钱等等，几乎悉数买书。但决不为藏书而藏书，所置备之书，都为治学之所用，不矜持版本之古老，更不求孤、怪。如说在版本上亦有所追求的话，那就是力求校勘之精良和使

用之方便而已。后自苏州迁沪，任职商务印书馆，则已藏书盈屋，而入藏之书，还都是为了用。其中仅地图类就足足有一书橱之多。不幸在“一·二八”事变时仅得空身逃难出去，而所藏图书则全都毁于炮火，其痛心是可以想见的。然而书不可一日无之，从零重新开始，节衣缩食，也得逐步购置图书。因遭此痛创，遂改署书室之名为“曲斋”。“七·七”事变前夕，及时搬家到法租界住，因此书籍总算未遭第二次厄运。然而房子小，子女多，竟至没有地方可陈书于架。到了第二年，才扩充了一间比一般所谓亭子间还要小得多的朝北小屋，才将书上了架。书架是请木工特制的，小屋四壁除门窗外，上顶天花板，全是精密算好尺寸的格格，不同开本的书，分别放入毫不宽裕而正合适的格内。此时则又更改斋名为“书巢”。叶圣陶先生于抗战初起已迁往四川，当时所谓内地与沦陷区之间总算还能转道香港而通邮，我父亲与叶圣陶先生在抗战时期通信。彼此都有将近二百通之多，所以彼此间的了解还是及时而详细的，叶先生听说我父亲又新建了“书巢”，先后于一九三八、三九两年作了柏梁体长诗《书巢歌》与《书巢记》（《书巢歌》已收入《篋存集》发表）。为此，我父亲在一九三九年又请我表姨夫、画家蔡震渊先生画了一幅《书巢图》，并请钱石仙先生篆引首，将一文一诗与图一并装裱成《书巢图卷》。

抗战胜利了，叶先生在《书巢歌》中所提到的重新聚首剧谈痛饮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与叶先生曾同在乐山避寇的贺昌群先生也再次在上海与我父亲会晤并共事，我父亲就先后请贺昌群先生、施蛰存先生、郭绍虞先生题了这一卷子，范洗人先生又为之题了签。一九五〇年我家迁居北京，与我父亲已阔别近十年的俞平伯先生又得重聚京华，得见此卷，当然也欣然命笔，题“浣溪沙”一首，并追叙了往事之沧桑。

数年后顾颉刚先生也来京任职，而且住得与我家极近。然而彼此皆忙于公务，竟未得机会一展此卷请顾先生浏览。一九六六

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前夕，颉刚先生手术后在香山枫林村休养，此时我也正住香山昭庙，在外文局外语训练班任教阿拉伯文，于是就请父亲让我将手卷携往香山，乘养病之闲，请颉刚先生一题。

先生一向善写长文章，竟将尚余空的近丈长的白尾，用极小的字一气写满，犹嫌不足，又另题一“书巢”额，并作小记，大致叙述了我两家藏书之殷，可作我国历来藏书家之殿等等。

不久，浩劫平地而起，这一珍贵的手卷总算幸免遭殃而存之至今，而先生所题《书巢》额，竟已不存，仅凭我之记忆如上述而已。

谢刚主先生在我父亲去世两年后，因卷尾已题满，就在一隔水上加题了一则，并录元末明初陶安所作《书巢》词调寄“太常引”两首，追念我父亲与“书巢”。此卷遂成为一件满无空隙，题咏琳琅的珍贵文献，也足以称之为近世战乱的历史见证吧！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日

